

第一阅读

喧嚣与嬗变中的时代镜像

□战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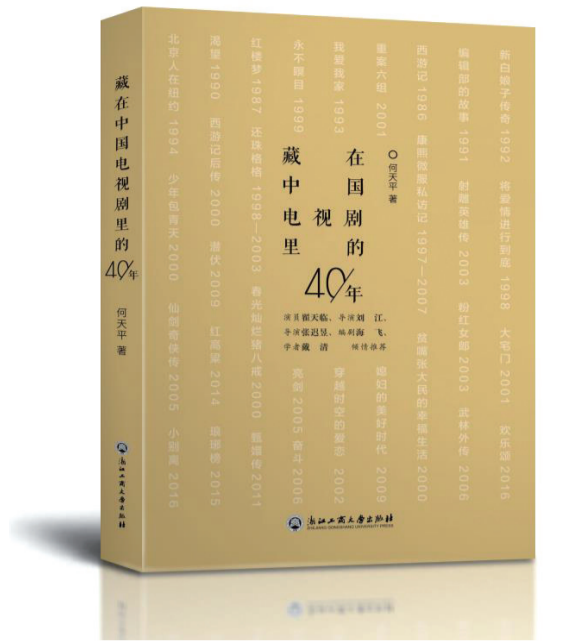
时值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文化评论家、青年视觉学者何天平的新著《藏在中国电视剧里的40年》(以下简称《40年》)出现得恰逢其时,勾勒出“90后”一代对电视史的独特阐释...

的姿态面对爱情、家庭与社会,社会进步的意义得到有力彰显。而在反复比照中,时代影像的历史观价值更加突显无余。

如果说《渴望》标志着大众话语的崛起与平民叙事的复苏,那么《编辑部的故事》则充分描摹出市民社会中的复杂心态。

纵观八九十年代中国的电视剧作品,回归传统与走向现代的步伐同频共振,欲望想象与市井人生交相辉映,思想分流在影视话语中不绝如缕。

世纪之交,《还珠格格》翩屏登场,在毁誉参半中开启了中国电视剧不可遏制的泛娱乐化浪潮。



就《40年》的结构框架而言,他一改章节连贯性的思路走向,代之以充满隐喻性的“幕”。以“幕”为单位,生动活泼地将影视剧的叙事单元与文本写作相对照,表现出充满奇巧的趣味性。

事实上,对电视剧的鉴赏既是一种自我体验,延伸了人们的情感想象;也是一种生活体验,消弭了距离,重构了时空,再造了现实;当然,它还是一种国族体验,书写历史,记录文明,聆听世界。

我们可以不必认同《40年》中的每一个观点,但何天平的写作为我们打开一扇窗子,透过它,我们依稀感受到不同年代电视剧的创作思路具有怎样的内在关联性。

《藏在中国电视剧里的40年》,何天平著,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

评点

敞亮的,或者暧昧不明的

——读翟之悦《雪团》

□何平

短篇小说《雪团》(《中国作家》2018年第8期)在中国现代文学是有传统的。这种小说,往往有自己的问题意识,所关注的问题往往是“当代性”的,同时也是“人性”的。

《雪团》涉及具体的家庭暴力和普遍的人情潦薄,在我们时代都是症候式的。

小说中,“雪团”是一只狗。雪团是男朋友余征寄养在阿沅这里的。雪团从哪儿来?它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又经历了什么?小说家生杀予夺的权力有一个方面就在于他们可以选择性地让读者知道什么,不让读者知道什么。

翟之悦《雪团》的几条事件线索,都是在敞亮与暧昧不明的选择中,就像黄昏大风雪中的街道,或者大雾中的树林,这是翟之悦想象的小说美学,或者简单地说,是她想象的小说样子:节制的、朦胧的、欲说还休的。

所以,《雪团》敞亮的是来自人间即使稀薄的,却珍贵的友爱——阿沅对赵晴,雪团和阿沅之间,李医生和赵晴之间;而那些余征和阿沅之间的冷漠,前夫对赵晴的暴力,部门主任对阿沅的刻薄——一个男性对一个女性缺少最起码的怜惜和同情,这一切,在我们生活的日常也许恰恰更为浩大更为习以为常,但翟之悦宁可让它们暧昧不明着。即使我们的世界的灰暗,依然有着友爱,让我们活在并眷恋这珍贵的人间,且使我们不悻于活着,这也许是翟之悦的生命哲学吧!

品鉴

时代在作家心灵上的投影

□吴玉杰

《胡世宗日记》时间含纳1960年至2015年,作为个人的生活流,留下鲜明的时代印记,形成历史的链条。不同的读者由于期待视野的不同在阅读的过程中各取所需,形成对日记的多向度回望,达成文本解读的丰富性与多样性的再创造。

个人历史与个人眼中的历史构成历史的多样态存在。几十年的生活、学习、工作经历以及在这些经历密切相关的家庭角色和社会身份(作家、军人等)在半个世纪的日记中零存整取,每一天似乎都存在散在性、碎片化,但每一天的记录则汇成几十年的人生轨迹,可以洞察作家为人民而艺术的精神追求、严格自我锤炼的人格养成以及文化交融的兴趣所向,又显现出人生的整一性。

从症候阅读的角度可以探求日记原生态的私密性与出版文本的公开性之间的复杂关系。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原生文本有删减之处,出版文本有作家自己的考量。我们可能无从知晓原生文本到底如何,但从出版文本的缝隙中,却可以窥见它一定的来路 and 选择。

无论是个人历史,个人眼中的历史,抑或是原生文本被删减的历史,都给读者留下巨大的阐释空间。每个读者由于前理解与期待视野的不同,他从日记中拿来、索取、提炼的“历史”也各不相同,我们可以读出一个人的奋斗史、一位作家的成长史、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一名军人的精神史,我们也可以概观当代文学发展史(重大文学事件等)、作家交流史(诸多作家往来信件等),乃至中国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教育史、外交史等等。当然文学批评家可以把胡世宗日记与作家的其他创作进行对照性与互文性阅读,可能更有利于文本的进一步阐发与深掘。总之,《胡世宗日记》好像是“史料库”,为需要的读者提供各种可能。读者各取所需,为己所用。

如果细细品味对胡世宗一生产生重要影响的处女作《给阿拉伯的小朋友》在日记中的地位,我们还可以从日记中抽纳出一个小朋友、一个作家、一个作家与世界文化交流的历史。1958年8月17日献给阿拉伯小朋友的友好诗篇,开启了一个人少年时代与世界交流的历史。8月17日,处女作日,反复被记录、被书写、被感动、被纪念的日子,他说:“每到这一天,我都会用各种办法给当年发表这首诗的责任编辑彭定安先生打个电话,向他表示我的感激之情”。这首诗歌在中国看世界,诗的稚嫩,显现出一个中国小朋友对阿拉伯小朋友的真诚声援。1960年代至1970年代中期,青年时代作家通过阅读俄国文学、社会主义国家文学,观看这些国家的电影,与世界交流。1970年代末开始的中年时代,他通过阅读英美文学,观看英美电影,听取关于英美诗歌状况的报告,与世界交流。更重要的是,这个时期中外诗歌的研究与交流逐渐打开视野,让他进一步领略丰富的世界文学。他在国内与美国诗人、日本诗人面对面交流,在韩国与韩国诗人进行对话,中国作家与世界交流的大门不断敞开,在世界舞台上中国的重要形象不断被塑造。而当诗人环球旅行与文化观光的时候,他更站在世界看中国,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从一个小朋友站在中国遥寄情思给阿拉伯的小朋友,到一个中国作家站在世界看中国,视点的变化随着空间的敞开而不断显现出历史的穿透力。在这里,历史的多样态存在与期待视野的多向度回望再次拓展了文本的文化时空与审美时空。



《百年浙江寓言精选》:

寓言文学的衍变之美

□张锦贻

写字桌上放着《百年浙江寓言精选》书稿。这是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周冰冰女士用了整整一年时间搜集、编定的。

书稿近350页,约27万字。以“百年”的时间跨度来说,书算不得厚;但,反复地读过后,觉得手里,心里都沉甸甸的。这本书,不厚却很重,67位作家中,包括老中青三代,其中,写文化寓言的鲁迅、茅盾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奠基人;写政治寓言的冯雪峰,写童话寓言的金江,写知识寓言的叶永烈,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代表性的作家;金近、鲁兵、孙建江,则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中有成就的童话、寓言作家。温州、黄岩两个地区作家群寓言创作的卓越成就和广泛影响,也是中国文学界较为罕见的一种现象。而入选本书的作品,几乎篇篇都在当时当地有过不小的影响,至少有六七篇是我国中小学语文课本的保留篇目。另有不少篇章被选入语文阅读课本。至于入选全国性各种文本选集的更有许多。显然,这本书看起来只是一个省、一种体裁的作品选集,却能够让人看到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寓言创作的轨迹,也看到新时代新寓言的新发展、新特色。它的分量自然是重的。

而从寓言文本来说,它一向短小、简捷,看起来,寓言作家无论怎样地使劲,也无法改变这一状况。可是,这本书中235篇寓言,却浓缩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代变迁、社会变革、生活变化、观念变更、鲁迅的《螃蟹》、茅盾的《以镜为鉴》、冯雪峰的《狼与兔的互惠协定》《战牛和敌国》,邱国鹰的《石匠和石佛》《千手观音》,沈冰的《猪八戒开店》《伯乐误期》,张鹤鸣的《刚长腿的小蝌蚪》《大营救》,其内容或彰显现实中处世的复杂和单纯,或展示反动统治者的虚伪和残忍,或揭露国民劣根性的缘由和表现;或铺陈生活中欲之贪,或表现关键时刻人性之丑;都以寓言独有的艺术方式,将特定

社会中角角落落的黑暗、阴险,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因光明照耀,作品的历史意义和道德价值显然是重的。

再从寓言自身来说,它始终蕴涵着劝诫、教训的意思和意味。这是它的灵魂、灵性之所在。但以往,它总是把这样的意思、意味隐藏在讽刺、嘲讽之中。而现在,浙江的寓言作家,并不以此拘囿思想、局限手脚;他们以生活为准,以文学为则,放手写来,顺乎自然,踏实写去,质朴必然。孙建江的《山和雾》《门窗》,邱国鹰的《林工和树》《橘农的教训》,陈巧莉的《与虫共舞的叶子》《老房子的话》,陈必铮的《喜鹊记着》《电光天平上的砝码》,有的以传统寓言中的鸟兽为主人公,写它们的习性;有的以描述自然万物的风貌为题材,写它们的多姿;有的以人们居住的房屋建筑为背景,写它们的状态;有的以日常生活的细物件为对象,写它们的品格;也都以寓言专有的艺术思维,将飞速发展的时代中的点点滴滴的领会、感悟,昭示在人人见到过、领略过的当下生活之中。谁都知道只有生活的赋予最是丰富无比,作品的理性意义和知识价值必然是重的。

从寓言表达来说,因为篇幅短、意蕴深,它的表达必得精益求精。这也是谁都知道的。浙江的寓言作家,就着力于构思的精巧精妙与语言的精当精美。金江的《乌鸦兄弟》《牛角尖中的老鼠》,邹海鹏的《选择》《分享的快乐》,阿童的《蜗牛写论文》《底线》,郑钦南的《天有多大》《老竹》,都可看到作者怎样捕捉人性缺憾中的微妙细节,怎样把握大千世界中的瞬间永恒,怎样透视天地万物中的本质之点,怎样思考繁复表象中的关键所在。又都以寓言自有的艺术呈现,将隐匿在作家心底丝丝缕缕的童真、稚趣,都体现在各相殊异、个性鲜活的不同故事之中。寓言文学是作家用口

夜酝酿的心思、反复锤炼的语言构建的艺术创造,最精致无比。作品的文化意义和思想价值当然是重的。

更须注意的是,作家们都注重想象和叙事上的新探索。这些作品,有的巧妙,有的诡异,有的象征,有的诗化,历史记忆与现实存在触碰生发,人生处境与个体心灵相互映照,便在色彩纷呈中姿态独具,在气息幽邃中芬芳自得。叶永烈的《金刚石姑娘不见了》《森林旅馆关门啦》,老强的《吸名烟的狼总管》《傻瓜鱼》,朱镛的《雨花石》《千里马的苦恼》,林海蓓的《古莲》《梅》,或用不寻常的幻想情景讲述寻常生活中的哲理和道理,或以不一般的实际存在呈现一般生活中的真诚和真实,或把很常见的某些状态提炼成常被忽略的一种意象和抽象,或将最熟知的大自然描摹为常被遗忘的意境和情境。也都以寓言特有的艺术手段,将隐藏在不同时期方方面面的睿智、机敏,都彰显在每日每时的人情伦常之中。世上只有真情无价,作品的美学意义和情感价值决然是重的。

浙江寓言作家的创新精神代代相传。明显标志有三:一是相同题材,思想更新。如徐强华的《鲤鱼跳龙门》、王禄鑫的《鲤鱼和乌龟》、金近的《小鲤鱼跳龙门》。二是,相类题目,艺术革新。如邱国鹰的《成功的阶梯》,谢尚江的《蜘蛛兄弟》,阿童的《成功》。三是相近题目,意蕴全新。如朱镛的《雨花石》、楼飞甫的《鹅卵石》、郑钦南的《老竹》、瞿光辉的《老鼠和象》、孙建江的《老鼠的懊恼与得意》。当然,艺术创新无止境,如林海蓓和夏予都写诗体寓言,却各有千秋;梁临芳和徐迅都书写自由平等,而各具特色;邱国鹰和邱来根都写乡土物事,竟视角大异,而徐迅将成语稍微改动作为题目,也别具一格。艺术贵在创新,作品的时代意义和社会价值当然是重的。